

通俗文化讀物

普式庚論集

李鄒緣芷譯



集議庚式啓

集議庚式啓

庚是啓



物讀化文俗通

集論庚式普

譯嚴李
芷綠鄒

閩校會協好友蘇中海上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一九四三年四月重慶初版
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海初版

(8854-1 滬報紙)

通俗文讀物普式庚論集一冊

基

價

玖

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必究

發行所 印刷所 印刷人 發行者 校閱者 譯述者
商務各印商陳 上海中蘇友好協會 茂莊
印書地書印刷懋 蘭綠
館廠館解書會

目錄

一 普式庚的偉大	I	盧波爾教授作	一
二 普式庚傳	V	基爾波丁教授作	三〇
三 孤獨的普式庚	A	布拉郭衣教授作	八四
四 現代俄國文學之父	I	萊支涅夫作	九二
五 「歐根·奧尼金」	A	葛爾斯坦作	一〇一
六 普式庚的抒情詩	L	鐵莫費也夫教授作	一五
七 普式庚的敍事詩	M	科拉甫兼克教授作	二三
八 普式庚的散文	V	西克洛夫斯基作	四六
九 劇作家的普式庚	G	維諾庫爾作	六一
一〇 普式庚與民間文學	M	阿查道夫斯基教授作	七四
一一 高爾基論普式庚	S	巴路哈蒂教授作	一八三
一二 西歐與普式庚	V	努斯塔德教授作	一九八
一三 普式庚與西歐文學	V	齊爾曼斯基教授作	二一七

- 一四 普式庚與戲劇藝術 M · 查郭爾斯基 一四一
一五 在俄國音樂中的普式庚 V · 佛曼教授作 一五二
附 普式庚年譜 罂洛夫編 一六五

普式庚論集

一 普式庚的偉大

I。盧波爾教授作

普式庚創造了俄國的文學語言，他也是現代俄國文學的創立者；他以他那不朽的作品使人類更加富裕了。

普式庚的名字，不僅不可分地同文學聯繫着，而且也同整個俄國的文化聯繫着，俄國這文化是偉大的俄國人民在與殘酷的自然的鬪爭中，在與形成俄國歷史的同樣殘酷的社會制度的鬪爭中建立起來的。

白林斯基說：「奧尼金」是一部民族的作品，因為牠是「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在今天我們可以說普式庚的作品構成了俄國民族生活和民族意識的藝術百科全書。

雖然普式庚的時代過去很久了，但是他的作品卻生存着，的確就像普式庚本人生存着一樣，如果可以說一個人會永遠生存着——在後代人的記憶裏。

一 普式庚的偉大

普式庚是那時代，殘酷的專制和農奴制時代的孩子。那時『遊蕩的暴君』亞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巴爾金（註二）的時代，用普式庚的一個同代者的精闢的語句來說『那是一個說話既危險，沉默也遭殃的時代。』

除了教會的學院之外，哲學是不准研究的，根據官方的理論，不准研究哲學祇爲了這單純的原因，『哲學的益處還沒有證明，然而可能的禍害卻由此而生。』在俄國，祇剩下藝術和文學的領域了。在審查無情的阻礙下，憲兵不斷的監視下，那時代惟一共難的文學更證明是藝術地表現民族意識的領域。在這過程中，主要的任務，卻歸屬普式庚的天才了。在一八二三年普式庚很有理由這樣寫着自己。

一個孤獨的自由播種者，

在繁星升起前，我趕早離了家，

以乾淨未污的手，

在被奴役的土壤間，

我散佈着給予生命的種子。

俄國的民族意識在反封建，反專制政權的鬪爭中形成了；在反布爾喬地主的政權的鬪爭中集中了力量。

普式庚的時代使他遭遇了兩個基本的政治問題：對於專制政體和農奴制，我們應該怎麼

辦。普式庚以他詩人的直觀把握了這兩個問題的真實含意，並且在他的作品中，指出了正確的解決。

普式庚夢想着——不僅夢想着，而且心信着——專制政體崩潰的時期一定會到來，他的名字也因之一定會被人記憶着。一八一八年他給查達耶夫 (Chadayev) (註二) 的信裏，這樣寫着：

同志，相信吧：喜悅的星將躍起，
在我們的眼前，一個光輝的表徵；

俄國將從漫長的睡眠中驚醒；

專制橫行的土地要破碎，

我們的名字將深深地銘記着。

普式庚描繪出農奴制下的鄉村的可怕的圖畫：

不管眼淚或呻吟，

命運注定了使人民苦困，

野蠻的地主以殘酷與獨斷的法律，

以皮鞭與樺杖強佔了，

農民的勞動，財產與時間。

彎身掌着非他所有的犁，

那被皮鞭征服了的瘦弱的奴隸

踏着無情的地主的土壤。

悲慘的桎梏拉着他們入了墓穴

希望與温情窒息在他們的胸襟

含苞的少女生長成熟了

全爲了無情惡棍的恣情放縱。

不論普式庚的戰略在他不同的生活階段中有怎樣的差異——他永遠認爲專制政體和農奴制是他鬪爭的敵人，就是因爲同這種敵人鬪爭，他才受傷而殞命了。

普式庚是具有革命意識的貴族之『光榮的一羣』中的一份子，這些貴族對專制政體和農奴制從事着無比堅強的鬪爭。他是十二月黨人的歌手，是有遠見的人，他的遠見使他超越了他的時代和階級。

在歷史上他是屬於他所生存的那個時代，可是在精神上他是屬於未來的。他說他自己：『我是未來時代的公民』。他是他那時代的一切矛盾的詩歌的焦點，的確他有時自己矛盾起來。但是通過這一切矛盾，還有一種一致性，那是領導我們和我們這時代的一個路線。

普式庚反對專制政體，反對農奴制，也反對當時中產階級的小市民。他活着的時候，沒有

看到革命的知識分子出現，更沒有看見革命的工人階級的興起。

去考量如果普式庚看見工人階級興起他會怎樣，這問題是無益的。能知道他在他那時代是如何，他由何贏得了詩人的令名，對我們就盡夠了。

正如伊里奇英明地指出，當時政治的叛徒，和有革命傾向的貴族是『無限制地同人民隔離着。』詩人普式庚接近人民，因為他是由人民創造出來的。

民族意識的深化和為民族意識而引起的鬪爭，是俄國人民鬪爭的回聲，這主要地意謂着人類個性的敏銳感覺和人類尊嚴的敏銳感覺。

甚至在幼年，普式庚就沒有同那些『祇渴望本身的自由的人們』發生過交往。他的人類尊嚴感，並不是個人的，主觀的感情，而是全人類，全民族的尊嚴感。他的個性，同樣地，也是病態的個人主義的表現，而是他每個同胞的個性。

這種普式庚的人類尊嚴的意識，這種普式庚的人道主義，一直到那時期在俄國文學中是前所未聞的，甚至到現在，在歷史的配景中也有絕大的意義，雖則也許還沒有被充分地給予評價。

西歐的人民度過了歷史上著名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的階段。恰如恩格斯公正地評斷，不論怎樣說，文藝復興的那些巨人，並不是偏狹的布爾喬亞。他們反對中世紀的理想——聖人和苦修者——而擁護他們自己生存的人類的理想，他們帶着顫動的生命力，他們感覺沒有人性的東

西是生疏的。他們反對埋沒人類個性的天主教堂的法式，而擁護人類個性本身和對個人尊敬的驕傲。他們反對陳腐的煩瑣的理論，而擁護活潑的天性和人類的經驗。他們反對因襲的教會藝術，而擁護人生的現實主義。這種過程意謂着封建意識形態的分碎，在歐洲僅在十五至十七世紀才開始，直至普式庚的時代才達到了頂點。我們可以拿一些光輝的名字聯繫起這個時期，在意大利有但丁，倍特拉克(Petrarch)（註三），薄卡丘(Boccaccio)（註四），在法國有拉伯雷(Rabelais)，莫里哀，和服爾泰，在英國有莎士比亞和拜倫，在德國有雷興(Lessing)（註六），哥德，席勒和海涅。但是歐洲需要四個世紀，纔能走過這個進程。

在法國，服爾泰的先驅是通俗的寓言，是拉伯雷和蒙恬(Montaigne)（註七）。我們在普式庚以前，有我們的民間故事，有羅門諾索夫(Lomonosov)（註八）和拉笛西契夫(Radishchev)（註九）。然而歐洲在四百年內走過的路，被我們在幾十年內，被普式庚在僅二十年內便走過了。的確，普式庚以其對自然的感情，以其對人類對人類個性和人類尊嚴的敏感性，普式庚以其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使他本身變成了我們文學上的文藝復興。在他二十年的創作活動中，普式庚追上了歐洲文學，并且將俄國文學變成世界文學的一部份了。

普式庚是我們的服爾泰，是我們的莎士比亞，是我們的哥德，因為普式庚吸取了世界文學，他在其中生存着和忍受着，並且他創造了作為世界文學一部分的嶄新的俄國文學。他變成世界的詩人了。

這個巨人，現在以智慧而深邃的眼睛望着我們。我們感覺到了他的眼光，我們似乎很榮耀。我們對他說：『您的話語，

「在那兒，在墳墓洞口的附近，

讓青年的生命狂歡吧。』

現在實現了。在俄國最偉大的詩人普式庚的墓邊，青年快樂的蘇維埃的生命在狂歡着。』

二

我們想要簡略地追溯一下詩人創作的道路，這是與他的政治生活密切相關的。雖然他的文學作品決不是他政治活動的副產品，普式庚常常給政府製造出重大的政治問題，這並不是無所謂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每個自由的句語，每篇不合法的文章』，都是屬於他的。否則沙皇政府就一定不會從他二十歲起直至他死，屢次放逐他，不斷地以憲兵監視他了。

普式庚的童年和成年期正是俄國最反動的時代。

在亞歷山大一世剛登基時所承認的進步的諾言，最後變成加深農奴壓迫的先聲了。

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失敗和相繼瓦解以後，俄國，這專制和農奴的土地，變成了歐洲的憲兵。阿拉柴也夫 (Arakcheyev)(註一〇)政權在國內蠢動起極端的反動。

農奴剝削的加深，不僅激起了農民暴動，並也激起貴族間的革命運動，特別是那些軍隊中

的貴族，他們曾參加過抵抗拿破崙的戰爭，並且也到過外國。這種運動最初以祕密的政治集會的姿態而出現，結果在一八二五年造成了十二月暴動。

當然，並不是這些政治事件造成了普式庚童年的最初印象和他未來創作活動的基礎。在後日，他在中學時感到了這種衝突。這位未來的詩人，創作的靈感的第一個泉源，是從他保姆亞蒂娜·羅蒂奧諾夫娜(Arina Rodionovna)所聽來的民間故事和他父親所收藏的法文書。

他剛一開始能自己讀書時，年青的普式庚就愛好起希臘抒情詩中的安那克里昂(Anacreon)(註一)的豪放。巴內(Parney)(註二)，哥萊塞(Gresset)(註三)，哥萊庫(Gregourt)(註四)，拉芳登(La Fontaine)(註五)，全是這早熟的孩子所喜愛的作家。這就是撫育這位未來詩人想像力的糧食，正如他在十五歲時所寫的：『想像力，祇有你是我的酬報！』

普式庚詩歌的前途明顯地在那時奠定了。

這是很自然的，普式庚在中學的幾年是詩人學習的時期；這也是很自然的，當時的法國文學起初應該比他保姆所講的民間故事對他更有利了。

作為幸福的貯蓄和同義字的愛情，友誼和醇酒，渲染着普式庚學生時代所寫的詩篇。那是在後日，一種新的潮流，才鮮明地充溢在他的作品裏。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就是當時革命的布爾喬亞的思想，卻徹悟地表現在明確的概念和形象裏。反暴君和反迷信的鬪爭含蓄着反專制和反封建政權的鬪爭，也含蓄着反宗教和

反教會的意識形態的鬪爭。這種鬪爭的號召，同樣也含蓄着反奴役，反偏見的鬪爭。爲了這鬭爭，他發出爲自由、平等和法律的要求，這是人類社會最高的法則，正是與『天賦人權』相關的。這種被他中學裏的青年教授庫尼金（Kunitsin）所傳佈的思想也打動了普式庚，因爲這種思想含着自由主義的精神，也含着革命的精神。

由於他同查達耶夫和沙皇村要塞的思想過激的軍官的談話，普式庚寫政治抒情詩的最初的一動機，越發加強了。這種影響使令普式庚，甚至在作學生時代，就變成了專制和農奴制的勇猛的政治敵人。

這種意趣在他的「自由頌」（Ode to liberty）裏真正達到了革命的頂點，其中表現着天賦人權的革命傳統的各種要素：『對暴君，對迷信，對奴役的反抗，以及對自由和立憲政體的勇猛的追求。』

「自由頌」（一八一七）是普式庚受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最高度的作品。同時在專制與封建的俄國，開始具體化並運用了的這種思想的成熟的手法，卻光輝地在他的『鄉村』一詩中實現了，這首詩在一八一九年寫成。

一直到那個時候，俄國文學中並沒有這種政治的世態畫，然而這種世態畫對他詩歌發展的基本路線，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這發展中的有活力的飛躍。

這種發展，是十分自然的，由阿查馬斯文學社（Arzamass）對『斯拉夫俄國的詩學』的文

學上的鬭爭，一直渡過到與十二月黨有關的團體『綠燈社』（半文學，半政治，半嬉戲的團體）。

在這個時候，普式庚寫出了樸素而又憤懣的「鄉村」（village）和迷人的長詩「盧思蘭與魯特密拉」（Ruslan and Ludmila），在其中他摸索着『昔日的陳跡』，『古老的故事』，並且他很自信地打破了陳舊的詩歌傳統。

普式庚顯然不能脫逃沙皇憲兵的監視；一八一〇年他被放逐到南俄。從那時一直到他死，詩人一直在警察經常的監視下。

在過去忠於沙皇的文學史家，都爭論着普式庚居留南俄是對他極端有利的。他沒有看見克里米亞，高加索，海洋和南俄的天空嗎？我們可以問那些歷史家，爲甚麼普式庚若不是一個政治流犯，就不能看見這些自然的美景。

普式庚在放逐期中，並沒有挫傷了他的精神，寧可說越法堅強了。在放逐期中，他寫成了韻文故事「高加索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巴克齊沙拉伊噴泉」（The Fountain of Bakchisarai），開頭寫「奧尼金」（Eugene Onegin），構思「吉普西人」（The Gypsies）。他的經驗時常令他回憶起那些拜命的人物，然而如果說這時期的普式庚祇是拜命的俄國的學生，那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在那些年中，普式庚已經吸收了他當時代的一切知識，追趕上了歐洲文學，如果說在俄國的背景和社會的特點中引起了他的拜命式的觀念和聯

想，那是不足令人驚奇的。

想要在普式庚的『拜倫式的詩歌』的人物中能發現有他自己的影像，那根據是更少了。『高加索的囚徒』，這暫時的『世界的隱者』，這想像的『自然之友』，很久以前就『失了飄逸』，而充滿『悽傷的回憶』。阿樂克祇希望他本身的自由，普式庚寫給黎萊葉夫（Ryleyev）（註一六）的信，並非是無所謂的，黎萊葉夫勸告普式庚，『至少將阿樂克寫成一個鐵匠』，『最好把他寫成一個第八級的官吏或地主』。

普式庚，在事實上是並且他自己也認為，他是一個『誹謗的和仇念深重的無知之徒的犧牲者』，他從不這樣地描繪他自己：『沒有狂歡，沒有希望，我痛苦着，我這感情的犧牲者』，他的希望和狂歡卻最善地表現在這時期的詩篇中：『但是不，我們將在幸福中快樂，我們將攜着血染的杯子去赴聖餐』，也表現在他去卡明卡（Kamenka）十二月黨的友人的會晤中了。

普式庚的自由主義者的情緒，祇是他在南俄的放逐期間才增強了，正爲了這原故，他才對政府越發不滿；在一八二四年，詩人從放逐的鄉間的更偏僻的一個新地方寫信給牙吉克夫（Yazakov）（註一七）。

『命運在惡毒地玩弄我。我有家不得歸，很久就在外面流浪，流浪到暴君想叫我去的地方。睡着以後，我不知道我會在那兒醒來。一直被追趕着，我像一個流犯似地拖延着我這帶着鍊銬的日子。』